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当代 国际政治析论

王逸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防大学 2 061 7462 8



论析治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俭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王逸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编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39,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033—7/D·399

定价 21.50 元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焘 陈 昕 黄仁伟

9DA85/05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库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与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跨出了学科的阀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命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由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

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将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界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献辞：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之类的东西总是最后写出。听起来这不大合乎逻辑，但情况仿佛大都这样。坐下来看这么一本篇幅不算小的书，可能要花费读书人一些时间，作为著者的我，理应把有关的情况做些交待，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批评。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的写作从1993年下半年算起，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最开始并没有想写书，只是希望探索平时研究工作中萦绕自己脑际又不得其解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现实的国际社会，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议论，但似乎缺少有说服力的答案；这里可顺手举几个题目，如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形态，地区冲突的分布和特点，主权观念的内涵和衍变，地缘政治的一般和特殊，科技进步的影响和后果，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新时期改进的可能等等。在一些师长和朋友的鼓励下，我陆续写了若干文章，承蒙各方的不弃，它们先后发表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杂志（如

《欧洲》、《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太平洋学报》、《东方》、《战略与管理》)上面,并且得到一些好评。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感到,许多问题靠单篇的论文不足以说透,有些论点还须找一些证据,做比较细致的分析,而书所能提供的优势正在于此。另一方面,平日里我也有一些看法,觉得现有的对国际政治的讨论不那么够,尤其对最近一些年的事态的追踪不让人满意,自己或许有必要以专著的形式提出一些问题,激发一点批评。几方面的原因合在一起,于是有了导致今天这个样子的成果的工作。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头脑中不时冒出一些试图驾驭全书的想法(讲大话的说法叫“指导原则”),尽管很难说已将它们贯彻书稿的始终。现在粗略地把它们记下来,算是袒露心迹,供同行“参观”,不怕贻笑大方。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叫做“做本世纪的同时代人”。话很简洁,涵义却深。我时常用它自省。对这本书,也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研究的课题要有当下性,二是写出来的文字要有共通性。所谓“当下性”,是指不仅被研究的对象是时下人们关注的,而且应当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不做那种不费气力、人云亦云的文字游戏,写出来的东西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真实世界的思考,包括不成熟的地方和心底的困惑。如果老用那种什么时候都不会犯错误的讲法,依靠一些众所周知、嚼得稀烂的道理,“以不变应万变”,就可能被真实的过程所疏远,受到读者的拒绝。因此,自己在写作时比较注意收集新的材料和同行的新成果,厚今(主要指冷战后的新形势)不薄古(指近代的理论命题和论据),重彼(指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不轻此(指国内同行的成果),论点以现实为根据,逻辑靠材料周延,很少

拿某些用起来方便但不太符合实际的东西对付读者和打发自己。“共通性”，则是语言文字的可交流性，即写出来的东西不致让人难以看懂。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文字博大精深，有它的特点和优势，但有时候也容易使人行文叙事完全形成一种旁人总不得其解的“话语系统”；而国际政治理论毕竟是一门产生和最先发达于欧美、如今广为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学者接纳的学问，有一些谁都不否认的道理和通达彼此的命题，包括一些基本的术语。所以，我尽量要求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讨论的问题，包括对他人工作的介绍，能够采纳一些通用的方式，“与国际惯例接轨”，避免晦涩繁琐。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在考察国际政治时，应当有什么样的立足点？不知这对别人算不算一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经常为此困惑。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透过人生的“万花筒”，你可以发现（或领悟？），在现今的时代，你对外部世界了解得越多，见到越多你原先有所不知而别人独具慧眼的见解，或者发现自以为知其不知的某些地方，你就越不敢下独断、做结论；尤其对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通常你的专业就决定了你对人类具有的共同问题——如生态保护、人口增长、军备竞赛、种族歧视、文化差异等——有更多的了解和忧患，你可能因此而很少做出一副“惟我族类”的俨然，相反，总希望自己成为或起码看上去像是一个能够避免狭隘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通常这就有了某种“国际主义者”的成分）。另一方面，不论你如何对外部的东西开放、明理和宽容，你毕竟是特定国家特殊民族的一员，你脱离不开生你养你的土壤和文化，你的父母妻儿在你的祖国用你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语言文字和习俗方式与你生活和交谈，你熟悉这种语言，喜欢这种交流方式；

中国的传统强调“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林风骨，更使你在研究中时时受到“不忘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提醒和（有时的）自责。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和不可回避，以致于我认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看待你研究的对象和提出建议，是当一个古道热肠的“体制中人”还是客观淡泊的“第三者”，真正是一个“首要问题”。无论别人怎么说“并不矛盾”，“可以辩证统一”，我却常常为此而自扰，并且多半不能释怀。外国学者好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依我看，以《大国的兴衰》和《为21世纪做准备》等著作蜚声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保罗·肯尼迪教授像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以《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等作品扬名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大概可以划入“民族主义者”的范畴；即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地位、社会角色的改变，也有可能（这里仅仅说“可能”）在立场、观点上发生变化。有名者如哈佛的国际政治学家、“相互依存”学说的创立人之一的约瑟夫·奈，前些年他当教授时看上去“国际主义”的成分比较多，近年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后，所做所为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模样。作为一个学者，是稳坐书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客观描述”世界风云，还是主动参与、积极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言？我看对很多人都存在一个抉择问题。其复杂和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曾经赋予期望的事情让你失望时，比如说当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国家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行使毫无道义的霸权或谋取偏狭短小的私利时，你可能会对常常坚信不疑的“共同利益”闪过一丝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加重了“民族一员”的意识份量。或者，当你的同胞你的国家表现出老也斩不断的劣根性和与人类进步格格不入的东西时，你可能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对外部世界的某些体

制、风习和追求增加钦羨之情。我不知道如何说明自己的取向,但必须承认在这些方面有些问题尚未梳理明白。就《析论》一书而言,它大概是矛盾的混合体,总的讲,我希望它客观一些,平和一些,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局限。

出发点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研究目标和具体动机,造成这样那样的差异。笼统地说,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实力有成就的学者可分两类:一类人在以往研究打下一定基础后,常以“发建言”、“济天下”为己任,论文或报告总不离对策和建议之类。另一类人数量上比较少,他们大部分时间埋头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做出来的成果“阳春白雪”,往往没有太多“实用价值”。与前一种学者对比,这种人“国际主义”意识更多一些。自然,道理上,“国际主义者”也可能提很好的政策方案,如罗马俱乐部的几份著名报告,联合国研究者的部分建议等,“民族主义者”同样可以“坐而论道”、专攻学理,如伊斯兰世界的某些经典考据者,亨利·基辛格的早期著述。在中国情况下,尽管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形,比较常见的情况则是,不少以“做学问”自诩的研究者不屑论策,宁愿把自己关闭在学院式的圈子里,而希望担当“智囊”的人士只看重理论的实用性,视政策需要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造成这种局面的,首先有客观的、非学者自身能够应对的因素,如政治风、商品潮、出国热等等。当时下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一股呼吁学者参政议政的浪潮时,当某些积极进言的研究人员受到重视并因此而闻达时,当多数靠微薄的工薪度日的学人四下为寻找课题奔忙时,你很难要求研究人员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艰苦长期的非盈利性研究工作。这当然对学术研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总起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近10年来虽然

有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长足进展,但学术性、理论性、逻辑严谨性仍严重不足,国际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常常为完成‘上面’交待下来的‘任务’疲于奔命,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和在清高淡雅的学院书斋里殚精竭虑、择善固执且从善如流的气质和氛围。我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服务’,也不反对一部分有志向且有能力把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依据或发展战略的同仁去实现他们的抱负;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包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一部分学者从事纯学术探索的同时,总有另一部分人(其中不乏大家,如二战时的本尼迪克特,今日的基辛格)努力使理论与政策衔接。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前一种人实在太少,而且不受鼓励,后一种人往往成效甚微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这是有目共睹,无须讳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急剧的开放过程中,政府领导人当然需要学者出谋划策;研究机构靠政府预算拨款,人事上保持‘上下一条线’,在当前的商品化、市场化大潮面前,捉襟见肘的学术单位和生计窘迫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下海捕鱼’,只好饥不择食地‘抢领任务’;在研究机构和大学,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中间不少是‘半路出家’,专业不对口,难免被迫或主动使自己适合于‘剪刀加浆糊’的角色,造成‘研究成果’与要报、通讯、新闻综述之类的东西无异的局面;最后,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反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有关‘济世’、‘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今天仍根深蒂固,这种实用主义的和政治本位的东西当然不无用处,但距为学术而穷究道理的科学精神毕竟甚远。”(《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欧洲》1993年第5期)这一困境既非短期所造成,更非一夕能解脱,只能从两方面着手改

进：一是学术外的环境，一是学术内的环境。学术外的环境重在切断非学术因素对科学精神的干涉，这牵涉到各方面的改革，恐不是学者所能及。学术内的环境则重在学者的自觉：对环境的、人格的、知识的、学科的自觉。在《析论》里，我尽量使文字从容一些，用比较温和的态度，研究一些问题，揭示某些困惑，说明情况的复杂性和单一判断的不易。有人或许读出一点东西，甚至“发现”为政策所需的某些根据也未可知，但它基本上没有对策建议，不是教科书，性急的朋友可能看不了几页。我希望它是朝着更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方向上的一种努力。

这里，“析论”只是非教科书的一种别称。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有“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不少地方自编了讲义，其中不乏有意义的和优秀的成果。不过，设计自己这本书的框架时，我想还是自由一些为好。具体做法是：选择自认为比较重要又没有现成答案的一些问题，分专题地加以讨论。析论不是定论，不是结论，不是导论，只是作者个人的分析，很可能是不成熟的有缺陷的甚至有错误的分析；它是一管之见，缺乏教科书具有的系统性，没有循序渐进的台阶，但有心的读者会通过它了解作者想些什么读些什么，认为何为重要何为复杂，对他来说哪些课题有待深究有待发掘；甚至，我可以这样说，贤明而通达的读者可能从作者提供的材料中得出远比作者高明的论断，发现作者研究工作的弱点和盲点。

“国际政治”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但理解上又有多义：一种是指国家之间的政治，英文里叫“politics among nations”，通常是指代表不同民族的政府之间的政治，如外交、国家贸易、势力均衡、相互宣战等；国际政治学的不朽经

典、摩根索教授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讲的便是这套东西。另一种是指存在于国际社会并且作用于这个特殊社会的各个国家的政治,英文为“international politics”,它与前者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较多:不止有国家、民族、政府,更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恐怖主义等超国家和跨国界的集团与势力;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是,它的重点不在国家(政府)层面,而在世界共同体(国际社会)。我们不妨将前一种称作狭义的国际政治(又叫“国家间政治”),后一种则为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可叫“世界政治”)。西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主要研究狭义的国际政治,把外交、军事等视为所谓“高级政治”,而把广义国际政治学的某些内容(如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现象,跨国公司现象,环保、难民、毒品和核扩散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现象)称为“初级政治”。这不仅是理论的偏狭,也反映时代的局限: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时间里,政府、以及由政府代表的民族国家,的确是国际间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相当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交往等等)涵盖了国际政治的整个画面。所以,并非令人奇怪的是,摩根索、基辛格、阿隆等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自己的后来被人推崇的作品里,把19世纪前后的欧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的纵横捭阖、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有关思想言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说,这种被称作高级政治的东西仍是任何一位国际政治学家的理论基础。但是,基础不等于全部,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由于科技及信息业的进步和非政府非国家行为主体对外交往